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上册

中华书局

纪念辛亥革命
七十周年
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上册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湖南省历史学会

中华书局

1983年·北京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全二册)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湖南省历史学会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1 3/4印张·611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1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098 定价: 2.45元

前 言

1980年冬,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在长沙举行年会,到会的除研究会理事外,还有二十多位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应邀出席。会议期间,不少同志认为,拟定于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名额有限,将有很大一部分青年研究工作者不能参加,因而建议为他们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机会,借以加快培植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后继力量。1981年春,章开沅同志和我联袂晋京,在不同场合与熟悉的同志谈起此事,同志们也咸表赞助,且力促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湖南省历史学会联合筹办,共襄善举。南返后,开沅同志、张磊同志和我就分别同两个会的理事洽商,旋即决定于1981年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并试办论文评奖。4月,会议筹备组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历史学会发出通知,提请推荐论文。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12月5日至9日在长沙举行。会议收到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历史学会或相类机构推荐来的论文计95篇。这批论文中,确有不少立论新颖,资料丰富,剖析细腻佳作;大部分是有史有论,言之成理,斐然可观。从论文涉及的问题来看,大体在以下几方面较明显地推进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1. 围绕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活动能量和动向所进行的研究和讨论,探索较深,对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澄清在海外产生的倡说辛亥革命不是一场革命的误解,有一定作用。

2. 对革命派各种团体,从兴中会起,到湖北花园山机关和兴华会、光复会以迄同盟会的建立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兼及共进会和中部同盟会,直至中华革命党,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和论述,从而对辛亥时期革命组织的酝酿、兴起、联合、分化、改组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订正,有助于更具体地阐明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的经历和功绩。

3. 对清末立宪问题作了较广泛的探讨。提交的论文涉及到立宪派的产生及其阶级基础,立宪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清廷“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结局,立宪与保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湖南、四川等省立宪派的特点等,这些都为给立宪派和立宪运动作出公允的估价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和论据。

4. 部分论文,或对史学界以往较少甚至不曾问津的领域作了一定的探索;或对过去视为禁区,咸感棘手的课题,撰文评述(如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胡汉民、汪精卫);或对辛亥革命在不同地区的历程作了较广阔的涉猎,等等;从而或多或少地开拓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范围。

这次会议所获致的成就,超过了我们原先预计的水平。这表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队伍中,青年一代正在积极弥补十年内乱所遭受的损失,刻苦钻研,迎头赶上;部分同志已是初露才华,堪称新秀。近年来,人们所引以为忧的学术界“青黄不接”的“饥馑”岁月,以这次会议的情况来类推,肯定会要大大的缩短;也许,那间隔是很有限的。

需要提到,会议所以获得优良的成就,是同试行论文评奖有联系的。推荐到会的文章,经十四位专家组成的评议组反复评议,最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又参考了若干代表所填写的意见表,评选出一等奖论文4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15篇。编入这个集子的19篇,是获奖论文的一部分。目录是按各篇论述内容的时间先后编排的。

负责本集校编工作的是刘泱泱同志。事前,我怀着欣慰的心情,逐一阅读了这19篇文章。兹将浏览所及,简略介绍。

部分论文,搜集了较多、包括流传不广的资料,对个别具体事项进行较细致深入的分析,从而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某些重大变革的性质和内在联系,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一文,通过对广东资本家的政治团体——粤商自治会的组成和历年活动的探讨,考察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和立宪两大运动中的动态和联系,较有说服力地回答了国外一些学者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议论;并据以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为说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提供了论据。与此相类的有《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较详细地叙述了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发生的原因、机构性能及其社会基础,对上海资产阶级积极谋求参政、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并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顺从共和”的原委进行评介,论证了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有《试论川路租股》,从考察川汉铁路公司凭借封建国家权力征集租股的沿革和规模入手,推敲了租股的性质,认为它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独特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征收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数额之巨,导致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急剧扩大和保路运动的加速发展,借以探究为什么四川近代工业并不发达而立宪派人却很活跃,为什么四川保路运动终能独步一时的主要原因。这类论文,研究路子对头,挖掘较深,从某一方面窥探了辛亥革命的实质和规律,在会上颇引人瞩目。

若干篇文章,分析较逊,但以资料丰富、叙述周详见长,对某些事变作了较全面或较确凿的铺陈和议论。《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一文,阐述了武昌起义后农村的阶级变动、政权演变和经济生活,对这次全国规模的运动在农村的反映,作了较具体的描绘,据以论断,武昌起义后中国农村仍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而物价飞

涨,人们的衣食住行日益艰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微弱,致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缺乏立足的根基,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为撰写此文,仅县志一类即查阅二百八十余种,其治学的勤奋和朴实,为到会同志所赞赏。《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的活动和斗争》一文,对同盟会在各地分支机构 的蔓延,开展革命活动的踪迹,作了较细致准确的介绍,读后较易使人理解,武昌起义后瞬息间就八方响应,迅速涌起全国革命高潮,是与革命党人的组织准备和积蓄力量分不开的。辛亥前近代学校的稀疏兴起和学界的动态,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提交会议的这一方面的论文计四篇。其中一篇《试论清末湖北近代教育》,所用素材较广,阐明张之洞在湖北办学和练新军,其主旨是反动的,但两者都转化为与其原旨相反的革命工具;对这种转化,张之洞的努力具有量变意义,最终经革命党人的催化,就导向了武昌首义的胜利。还有一篇题为《“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的文章,肯定花园山机关是早于科学补习所,在湖北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显示出收集资料较多、考订较细的特色。

部分论文,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见解,获得新进展。《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老课题,但作者把握住三种不同的思潮——改良派的民权思想、革命派的民主思想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民主议论,分别地论述了各自的内涵和特点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影响,仍然写出了新意;并从而引申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看法,即认为由改良派到革命派以迄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的理解,本应是资本主义制度由兴起而鼎盛而衰落这样一个历史地位的变化在思想领域里的投影,这一变化过程,在西方经历了三、四百年,而在中国,则仅十余年的短暂岁月,正足以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未老先衰和在中国没有前途。研究梁启超思想的论著,为数已不少,提到会上的《从戊戌到辛亥 梁启超 的民主政治思想》

一文,对梁启超此一期间民主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显著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作了较深刻的阐述,读来仍感颇有独到之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论文,没有象以往这类文章一样侧重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侵略实质的揭露,而是探讨了美国对华政策产生的原因,并把它同清王朝的内政、外交联系起来,进而论述它对清王朝命运的影响。《共进会平议》的作者进一步论证了共进会的成立对同盟会是一种分裂,并查阅了较多资料,具体比较了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起义中的作用,得出了后者所作贡献稍逊于前者的结论。《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的作者,运用《自治学社杂志》,将贵州自治学社由立宪转向革命的经过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还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对广东会党的成份和特点,以及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使这一课题的研究有所发展。《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文,则从考察湖南资产阶级上层的具体情况入手,阐述了湖南立宪派活动的特点及其同革命派的关系,这对进一步研究清末立宪运动有启发意义。

还有部分文章,是试图弥补研究的薄弱环节。如《试析国粹派经学的两重性》一文,对辛亥革命期间国粹派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作了较好的分析。中国经学流派繁衍,众说纷纭,而在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年代为少数革命党人所假借,这是个难题,作者可以说是为解此难题开始作了有成效的探索。中华革命党前人专论甚少,这里收录的《中华革命党略论》,叙述了该党的始末,于肯定它倒袁先锋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它的方略的失策和脱离群众,进而揭示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走向终结的必然趋势。《论秦力山》是此次会上人物评论中使人感兴趣的一篇,作者自称,是试图以秦力山的生平和思想演变为例,说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代进步青年,是怎样与时代潮流俱进,经过痛苦摸索,奋斗追求,才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

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的文章,是以往研究 不够的,作者对 武昌起义前后康、梁一派同清朝亲贵、袁世凯集团、国内立宪派 势力以及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理出了头绪,作了分析。还有《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一文,不仅就此一问题作了较详的 阐述,而且对杨衢云给以新的评价。

无庸讳言,这十九篇文章毕竟是青年研究工作者的作品,因而多少还存在一些微瑕小疵,显得功力不深,文采不足。但 尽管如此,这个集子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其中一部分 论文,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课题;大多数论文则是有新意,有独到 见解,或是有新资料,都分别对同类课题的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意义。无疑,它不失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进程上有影响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

林增平

1982年2月

目 录

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	袁鸿林 (1)
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	陈剑安 (23)
从戊戌到辛亥梁启超的民主政治思想·····	王好立 (73)
“武昌花园山机关”初探·····	刘建一 李丹阳 (106)
✓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资产阶级	
民主思想·····	熊月之 (149)
✓试论清末湖北近代教育——从教育角度	
看武昌首义的社会背景·····	陶宏开 (184)
论秦力山·····	彭国兴 (225)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的活动	
和斗争·····	周兴梁 (249)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傅志明 (324)
试论川路租股·····	鲜于浩 (347)
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	邱捷 (373)
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	吴桂龙 (401)
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	张恒平 陈世和 (447)
共进会平议·····	周秋光 (463)
试析国粹派经学的两重性·····	罗福惠 (500)
辛亥革命中康、梁一派的政治活动·····	陈长年 (531)

辛亥革命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研究

- 兼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卿斯美 (555)
- 武昌起义后的农村变动……………李喜所 (595)
- 中华革命党略论……………王 杰 (651)

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

袁 鸿 林

在兴中会时期,革命派内部存在两派,即孙中山一派和杨衢云一派;两派之间的合作、矛盾以及最终分裂的关系,对辛亥革命¹的早期运动起着连续性的²重要影响。鉴于国内外研究孙中山的大量论著一般都为大家所了解,无须多加复述,本文将较详于杨派一方,来对孙、杨两派关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不当之处,亟盼读者指正。

一 辅仁文社的性质与孙杨两派合作的基础

一八九四年底,孙中山创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诞生。但当时陆续入会的一百余人情形复杂,真属革命的很少,并未构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核心。一八九五年春,香港兴中会成立,这才形成了革命派的第一个战斗核心。从檀香山兴中会到香港兴中会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而香港兴中会的组成则基本建立在孙、杨两派合作的基础上。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人拥孙中山为首,形成了孙派的核心;杨派则以加入兴中会的原辅仁文社诸人为核心,奉杨衢云为首。

辅仁文社,另有英文名为Chinese Patriotic Mutu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中华爱国互助改进会),一八九〇年就开始在香港发起,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正式设总部机关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社员共十七人,有姓名可考者如下:杨衢云、谢纘泰、

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

周超岳、黄咏商、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温宗尧、胡千芝、陆敬科等人，杨被选为会长。^①

杨衢云、谢纘泰是拜盟兄弟，为该社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

杨名飞鸿，原名合吉，字肇春，号衢云，福建海澄人。其祖父官至署新兴县知县，后因读史而悟种族压迫，弃官出洋，居南洋檳榔嶼。其父即生于该地，十六岁时才返回家乡，后定居香港，先后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一些书院的教员。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杨衢云诞生于香港。幼从父读，十四岁投香港国家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手手中三指。于是转而学习英文，二十岁毕业，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职。不久改就招商局书记长。与孙派合作时已改就新沙宜洋行副经理。杨“仁厚和鸷，急公好义，尤富于爱国思想。……自甲申中法战役之败，即有志于反清复汉，尝于粤中物色同志……”^②“少时曾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者，辄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盖具有种族思想者。”^③

谢纘泰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六日生于澳洲悉尼。七岁受基督教洗礼。其父谢日昌在澳洲经营出入口货贸易数十年，开有商店“泰益号”，少属洪门党籍，夙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谢纘泰自述：“我父亲是澳洲中华独立党领袖，当我约十二岁时，他对我讲述满族鞑虏残暴征服中国的故事，于是我发誓长大后回国，”以便“竭尽全力”将“满族鞑虏驱逐出

① 谢纘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Tse Tsan Tai, The Chinese Republic: 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Hong Kong, 1924）第7-8页。社员人数，一般记载均误作十六人。黄咏商为社员，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上海1947年版，第14页；从上引谢书中也可看出黄为杨派人物。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6页。

③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76页。

謝纘泰

去”。①一八八七年五月，谢十六岁，与母亲、弟妹等离悉尼移居香港。不久入域多利书院，先后结识了杨衢云、周超岳等人，开始酝酿发起团体。谢说：“在域多利书院期间，我结识了不少书院内外的年青有为的爱国者，这使我开始认识到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逐……满族鞑虏的运动。”②毕业后，谢在香港政府公务局当职员约十年。一九〇〇年任 Bayd Kaye 洋行 香港支行买办；同年又在 Shewan Tomes 洋行任副买办。一九〇三年，与英人克银汉、瓦特两人办《南清早报》。晚年以经营矿产终其生。

从杨、谢的情况来看，一个是由于中法战争之败的刺激，爱国思想发展到反清思想；一个是幼承家训，很早就有反清意识，经中法战争之败，则更加强烈。他们一旦相遇，便开始了组织团体、密谋革命的活动。

辅仁文社其他人的情况，可考者还有：黄咏商，广东香山人，世居澳门，与何启有戚谊。其父黄胜是早期玛礼逊教会学校的学生，与容闳、黄宽联袂留学美国，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回国后曾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与王韬交厚，两人曾合资经营《循环日报》。“咏商好读《易》，研究甚深，尝言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顺天应人，此正其时云。”③刘燕宾，招商局书记长。胡干芝，沙宣洋行买办。陆敬科，香港域多利书院教员，辛亥革命后曾任广州政府外交官。④周超岳，广东南海人，商人，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温宗尧，字钦甫，广东新宁人，香港皇仁书院英文教员，黎科、陈锦涛、王宠惠皆其门弟子。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起义，

① ② 前引谢纘泰书，第7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重庆1945年版，第6页。

④ 以上据前引谢纘泰书，第7—8页。

南清早报

由黎科介绍温为自立军驻沪外交代表。一九〇六年充粤督岑春煊幕僚。及辛亥革命,在沪佐伍廷芳任革命政府外交副代表。^①民元时与潘鼎新合组国民党(不是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

他们这些人长期生活在香港或海外,大部分接受的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大部分都有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洋行和香港政府机关任职的经历,自称自己是“研究英文的中国学者”^②。他们了解世界大势,在中外情形的强烈对比之下,深感满清统治下的中国黑暗腐败和面临列强侵略的严重危机,产生了爱国维新乃至反清革命的新思想。其中杰出的如杨衢云,成为中国人中最早坚定地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革命家,他的共和国理想对孙中山还有不小的影响。^③象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以前还不曾有过的,他们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批新的政治力量的一部分。

从前引谢缙泰的话来看,辅仁文社的宗旨当有两条核心内容:一、“进行中国大众的革新”运动;二、“驱逐满族鞑虏”。第一条属爱国维新,第二条属反清革命。辅仁文社的社纲反映了爱国维新的宗旨。社纲内容六点如下:“(1)纯洁品性至最高程度;(2)禁染社会恶习;(3)为未来中国青年作表率;(4)经种种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5)获得西方优秀科学文化;(6)

① 以上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上海1945年版,第21、63—64页。

② 杨衢云致谢缙泰函中语,见前引谢缙泰书,第15页。

③ 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孙中山曾在《大同日报》编辑室对刘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成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刘又作按语:“陈少白言孙先生学医,后坚决排满,于共和制度,尚有出入。与衢云交,既莫逆,衢云则非造成民国不可,一日议论有出入,衢云持先生辨,盛气欲殴之。予在旁,分开两人。”见《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版。

学习如何做爱国者,如何从事爱国活动和如何消除祖国所蒙受的屈辱。尽心爱国。”^①其中提出学习中外“武”的知识颇耐人寻味,当有诉诸武装斗争的意图。但毕竟社纲未明确揭橥反清革命的宗旨,原因何在?谢纘泰自述:“在我的十六个友人中,为我信任并知道我的秘密的主要人物是杨衢云、陈芬、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和刘燕宾,其余的人并未让其与闻秘密。因为在当时公开鼓吹革命则太危险,而且广州清政府的暗探特务还遍布了香港殖民地。”^②这说明在当时的险恶条件下,辅仁文社开展活动只能行谨慎之策,不在社纲中揭橥反清宗旨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兴中会的章程也始终未揭明这一点一样。而且,社人中思想不尽一致,只有近半数的人有反清革命的要求,这也是后来辅仁文社与孙派合作时,社员并未全体加入兴中会的缘故。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辅仁文社是一个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小团体,它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爱国维新,而且在它近半数的成员中还密以反清革命为宗旨。这就是辅仁文社的性质。辅仁文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团体,比檀香山的兴中会早出世至少两年多(若从它正式设总部开始算)。把它说成“内容仅在多购置新书报以开通

① 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与中国早期革命运动》(Chün-tu, Hsueh, Sun Yat-sen, Yang Ch' u-yün, and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见薛君度:《中国近代革命领导人物》(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1973) 件,系谢第102—122页。辅仁文社的英文原名和社纲六条均出自该社原始文纘泰遗物,薛君度于1963年12月29日在香港访问谢的儿子时得以目睹,前此则不为人知。故以前的历史著作都说该社社纲只“尽心爱国”四字。其实这四字只是他们的“座右铭”,附于社纲末端。

② 前引谢纘泰书,第7页。谢还说到他不得不与清方的暗探进行斗争,而西人的警探也不时地走访辅仁文社的总部(同书,第8页)。

民智”的新学团体,或者只说以“尽心爱国”为宗旨,似非全面、深入之论。

正当一八九〇年杨衢云、谢纘泰等人发起辅仁文社的同时,被人称为大逆不道之“四大寇”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也开始了纵论时事、发表爱国维新和不满当朝的“革命言论之时代”。辅仁文社设总部机关后,“社员中有罗文玉者,与顺德尤列善,尝介绍之于文社,屡至谈学,因得与诸人游。”一八九二年秋,杨衢云通过尤列结识了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等人。杨衢云与孙中山“畅谈救国大计,一见如故。由是朝夕常至,至则抵掌而谈,达旦不倦。公(指杨——引者)主张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共策进行,总理颺之。翌年……冬初,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园之抗风轩。……时到会者,有总理及程耀宸、奎光、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列诸人。总理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而不及制定会名。公居港,弗克来会,次日尤列适往港,为公道之,公大称善。”^①这段材料说明:孙中山组织革命团体的思想最早受到过杨衢云主张的启发;孙中山等人在抗风轩的“革命言论”也与杨衢云密切相关;杨衢云当时已向孙中山提出“共策进行”即两派合作的问题。

当时,杨派在反清意识方面较强烈,与清政府没有什么联系。而孙派的情况则不同。孙中山曾于一八九〇年致书辞职清朝官僚郑藻如,一八九四年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些“上书当道”,幻想清政府改良自强的活动,体现了孙派人物当时改良的进步思想是主要倾向。这也是孙中山当时虽同意杨衢云的主张,并且在同志中也提出讨论,获得全体赞同,但毕竟未能实践的原因所在。由于上书遭到李鸿章的冷遇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五集,上海1947年版,第9页。